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做客腾讯会议室主讲

#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梁有福



“八五”保护维修工程,降低窟前地面后的五华洞外景

“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做客腾讯会议室,线上主讲《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文化遗产》,科普多学科、多部门联动保护石窟文物,推动“云冈学”发展等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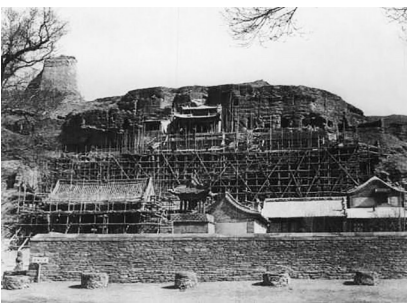
为深度开展“云冈学”研究,2021年,省委、省政府成立新的云冈研究院,并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大同大学分别设立云冈学研究机构和专门方向。2021年,“石窟寺保护与传承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落户云冈研究院,以期推进全省石窟寺的保护和发展。

在当天的讲座中,杭侃围绕什么是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交叉学科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三方面内容展开讲解,全面介绍了国外多学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情况和国内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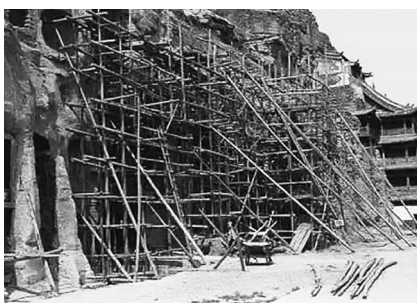
杭侃说:“文化遗产是人类由过去各种文化传承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赋予一个地方以可识别的

特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是制定文化政策的重要基石。石窟寺历经岁月的沧桑,存在着多种病害,需要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但是保护需要采取的不仅是岩体加固和防止风化等技术措施,还应当考虑将开凿过程中的各种信息纳入整体保护的视野之中。因此,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在实施保护措施的不同环节,都有必要强调多学科、多部门的协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对石窟寺的本体信息进行有效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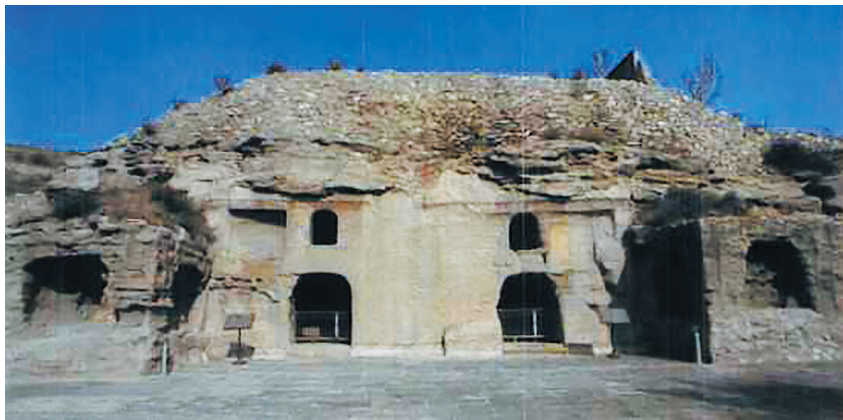
通过讲座,许多网友对云冈石窟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以及景区建设概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批准划定石窟保护范围,正式拉开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云冈石窟的序幕。工作人员成立了调查组对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以石窟第1、2



上世纪60年代,云冈石窟加固维修工程



1974—1976年中部窟群修复加固工程



经过加固保护后的1、2窟外景

窟为试点进行了整修实验,主要针对第1、2窟岩石风化和崩塌的情况,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加固和治理。此后几十年间,云冈石窟先后进行“三年保护工程”“八五保护维修工程”“109国道云冈段改线工程”等,为云冈石窟申遗及后来的保护维修,奠定了良好基础。2001年,云冈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2008年,启动石窟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使云冈石窟核心景区面积扩大10倍,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年,云冈石窟成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此后4年间,云冈石窟联合考古

队在进行窟顶考古发掘时,发现两处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和铸造工场遗址。其中,北魏佛教寺院遗址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较完整的石窟寺遗迹。该考古项目入选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云冈数字中心的成立让云冈石窟进入“数字化”时代。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石窟风化速度进行监测,对石窟本体进行数字化采集并建立洞窟数字档案,利用3D打印技术成功复制出云冈第3窟、第12窟和第18窟……近年来,该中心在石质文物检测技术、洞窟研究保护及资料档案保存技术等方面均取得创新突破。

## 云冈石窟北魏年间的碑碣铭文(上)

付洁



云冈第11窟东壁上层《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

云冈石窟是一部北魏王朝的断代史,它以一座山的雕刻将拓跋鲜卑的发展盛衰刻录在山崖峭壁上,每一座洞窟都是一段历史的铭记,每一尊佛像都是历史的回放。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味,才能真正体悟到云冈石窟的价值所在,才能重现历史的厚重。自佛教艺术产生之时,就出现了将文字雕刻于石质版面上的情形。这样的佛教艺术随佛教进入中国,并与中华文化“树碑立传”而惯于记事的作风相结合,使得其更加被重视和采用。

云冈石窟作为世界上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院之一,亦保存了一些北魏和其

他时期的铭文碑记,主要有造像题记、碑记、铭记三大类。题记雕刻多出现在龕座或佛座之上,个别刻在千佛造像龕柱上;碑记多呈长方形或方形,也有单体石碑,多置放在窟前古建筑群等处;铭记形式多位于摩崖雕刻、榜题式刻铭,出现在窟壁、造像龕、明窗、门拱、崖壁等空白处,大多数因风化现已无法辨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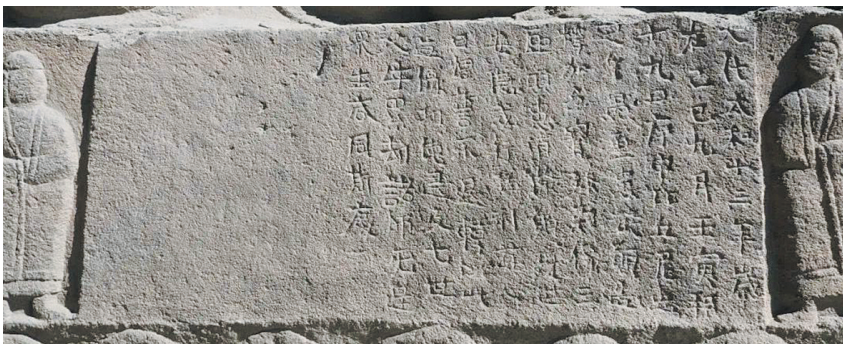
文字有阴刻、阳刻和墨书三种。书体有魏碑、行、草、隶、篆、楷。年代上至北魏,下见辽金、元、明、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冈石窟雕刻中的古碑碣由于历史久远,自然风雨侵蚀或人为破坏等诸多原因,流传于今者,仅百余通。在保留较少的石刻文字中(包括元代墨书),最早的是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造像题记,雕刻于第11窟的东壁上。北魏年间重要的碑碣还有现存放于云冈博物馆的昙曜碑等。

《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记》。年代:483年(北魏太和七年),位置:第11窟东壁上层,尺寸:宽78厘米,高37厘米。

录文:邑师道育、文殊师利菩萨、大勢至菩萨、观世音菩萨、邑师普明、邑师昙秀、邑师法宗。太和七年,岁在癸亥,八月卅日,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积,生在末代,甘寝昏境,靡由自觉。微善所钟,遭值圣主,道教天下,绍隆三宝,慈被十方,泽流无外。乃使夜夜改昏,久寝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润,信心开敷,意欲仰酬洪泽,莫能从遂。是以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窟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

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临转轮;神被四天,国祚永康;十方归伏,光扬三宝,亿劫不随。又愿义诸人、命过诸师、七世父母、内外亲族,神栖高境,安养光接;托育宝花,永辞秽质;证悟无生,位超群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随意净服;若有宿殃,堕洛三途,长辞八难,永与苦别。又愿同邑诸人,从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静,明鉴实相,昂扬慧日。使四流顷竭,道风堂扇;使慢山崩颓,生死永毕。(佛性明显,登阶住地,未成佛间。愿生生之处,常为法善知识,以法相亲,进止俱遵。形容影响,常行大士,八万诸行,化度一切,同等正觉,逮及累劫先师七世父。

附注: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早、字数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块造像题记。题记体现了三个层次的愿望:一是“为国兴福”,祈愿国祚永康,十方归伏。二是“愿义诸人”位超群首,永与苦别。三是“愿同邑诸人”常为法善知识,常行大士之事,福报永世。题记与所造龕像符契相和。所造“九十五区”像是指供养群上方造像,其中千佛88身(有2身毁),4佛(二佛对坐、两单坐),3身菩萨(一交脚二供养菩萨)。“诸菩萨”是指并排而坐的文殊、势至、观音三菩萨。“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形象是题记和菩萨两侧的世俗供养人造像,其中右侧36身女性供养人(2名邑师不计),左侧18身男性供养人(有2身毁,4名邑师不计)。此记对研究北魏平城地区佛事活动有着重要价值,被看做是云冈皇家石窟北魏太和七年(483)向民间开放造窟的标志,第11窟内众多的无统一布局的龕像证明了这一推测。另外,此题记是中



第17窟明窗东壁《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记》

国石窟现存最早的北魏造像题记,也是中期魏碑的重要遗存,记中有约40多个碑别字,是研究魏书别字书体的稀有参考资料。

《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记》。年代:489年(北魏太和十三年),位置:第17窟明窗东壁,尺寸:宽60厘米,高27厘米。

录文:大代太和十三年,岁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发愿造释加、多宝、弥勒像三区,佛性消除,愿现世安稳,戒行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转。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诸师、无边众生,咸同斯庆。

附注:题记所在龕像的三区像释迦、多宝、弥勒分别代表现在、过去、未来世,是三世佛的象征。同时弥勒在上,释迦多宝在下也是弥勒净土信仰兴盛的表现以及太和时期“二圣”执政格局的体现。弥勒净土在婆娑世界上,相比其他净土世界更易修达,深受北魏佛家推崇。此题记意义在于:1、首次明确提出交脚菩萨形象为弥勒菩萨。2、龕内组合、造像是太和十三年造像标志形象,为判断其他造像时间提供了参考依据。也说明此时的补刻行为进行到早期的洞窟明窗、南壁等处。3、题记意义表达完整,但没有占满铭石,留了空白,有可能是惠定“认购”的民间工匠所造龕像,然后把她的简短的愿文刻了上去。4、此记与第22窟“尼道法”造像记,第20窟前的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碑,以及18窟“大茹茹”题记等女性题记相距不远,可认为“昙曜五窟”区域曾是女尼活动频繁区。



造像正面



造像侧面

1981年10月,大同晋华宫矿在马武山上进行基建工程施工时发现一件北魏石刻菩萨像,现收藏在云冈研究院陈列馆内。这是一件砂岩质地的单体北魏石雕菩萨像,像高61厘米、座高4厘米、通高70厘米(包括菩萨的头光)。菩萨头戴三珠宝冠,冠上三个圆盘之间用忍冬纹装饰,冠檐两侧垂下三角形冠披。额上发际由中间分开。造像面相方圆,眉骨微微隆起,眉线清晰,双眼微睁,嘴角上翘,鼻尖和嘴唇在出土时残损。双耳佩戴圆形耳铛,素面无饰。直径22厘米的圆形头光右上部残破。身躯壮硕,双肩直挺,宽胸细腰,颈部饰桃形项圈,左臂上用阴线刻出臂钏。上身斜披络腋,仅刻出轮廓,下身穿羊肠大裙,腰间束带。右手持莲蕾贴置胸前,左手执桃形物垂在体侧。帔帛沿两肩贴身搭下,穿绕双肘后下垂外扬。跣足立于方座上,两脚稍向外撇。这尊菩萨像的样式与云冈二期菩萨像面相丰满、躯体健壮的造型特征一致,菩萨头上的冠式和两耳的圆形耳铛在平城地区最早出现于云冈第7、8窟的这组双窟,在稍晚的第9、10窟仍然沿用。考虑到马武山新出土菩萨造像的样式与云冈第7窟明窗东侧的供养菩萨和第8窟主室东壁第3层南龕右胁侍菩萨像相同,再结合第7、8窟和第9、10窟的菩萨像风格以及大同北魏方山出土的佛教造像一起分析,可以推断,在马武山上新发现的这身菩萨造像的完成时间应在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前后。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大同地区近年来出土的单体北魏佛教石雕像数量十分有限,然而从出土地点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北魏时代的文化遗存,再联系到史料中对当时宗教建筑的记载,这些遗址可能与北魏佛教寺院有关。举例来说,1980年大同市城南轴承厂出土的交脚弥勒菩萨像,同时发现有北魏石柱础和瓦砾等。1987年大同市城西的小站村附近发现的一处北魏建筑遗址中,在残存着曲尺形排列的五个柱础的建筑一侧,发现一件北魏云冈三期石刻佛像屋形龕。尽管未对这些发现地点进行考古发掘,但根据建筑遗址和出土遗物的并存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出土佛教文物的地方与北魏寺院建筑有一定关系。北魏自文成帝复兴佛法以后,僧人和寺庙的数目日有增加,《魏书·释老志》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京内有寺院约百所,以上两处可能即属于当时的佛教寺院遗址。然而,马武山发现的这身菩萨像因尚未完工,目前很难解释为被供奉礼拜的尊像。其出土地点究竟是一处佛教寺院抑或是一个石刻加工场,有待深入地调查与研究。另外,20世纪90年代云冈石窟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期间,据当地群众提供线索,发现云冈石窟东面的山顶上,距第1窟约300米处一个大土堆顶端正中有一个盗洞。经抢救性清理得知,这是一处北魏塔基遗址,基座平面接近正方形,东西长12.2米、南北宽12.1米,四周用砂岩石片包砌,内部填以夯土,其上为类似塔庙窟的平面呈“回”字形的建筑结构。基座南、北两面分别有东西向、南北向的斜坡慢道。根据塔基形制及所处位置等,认为其可能属于一处寺院遗址。此塔可视为山下的云冈石窟与山上的寺院连接的纽带,与郦道元描述的云冈“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记载相吻合。近年云冈山顶的考古工作收获颇丰,新发现两处佛教寺院遗址:西部窟群第33窟的山顶上发掘出一处较完整的北魏佛教寺院遗址,有塔基、北房、东房和西房等,其中北房为前廊后室;中部窟群第5、6窟的山顶上发掘一处实心塔遗址,其中部方形夯土塔心应是北魏遗存,外形经辽金时重修成为八角形,进一步印证了《水经注》描写的云冈石窟雄大气象。以上发现使我们对北魏时期云冈寺院分布情况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菩萨雕像表面虽然没有发现任何凿刻的痕迹,但是明显地用扁铲进行过修整,而且铲痕比较清晰,这些现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石窟造像的雕刻工艺。首先,菩萨立像的斜披络腋、下身的衣裙、腰间的束带、臂上的钏饰等仅刻出的轮廓线,甚至是头冠装饰的细部也没有进行雕



菩萨像正面与侧面

琢,为我们研究北魏平城地区石刻造像的雕凿程序提供了可靠依据。其次,结合云冈石窟一些洞窟中遗留的没有雕凿完的佛、菩萨像等实例以及大同地区近年出土的北魏石雕器物,可以对云冈北魏造像的工艺方法与雕刻技术进行细致的分析与研究。通过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去认识和了解石窟开凿时一些具体尊像的凿刻过程和有关技术工艺,总结其中的基本规律,也是北魏云冈石窟考古研究工作中十分有趣的一个方面。

绘图 兰静 摄影 贾新华